

清末的白話啟蒙運動與《啟蒙通俗報》

李 慶 國

Qimeng Tongsu Bao (啟蒙通俗報) and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of Vernacular Chinese in Late Qing

Qingguo Li

—

清末的白話啟蒙運動是戊戌變法失敗後出現的，並延至民國初年的一場持續時間長、規模大、影響也較為深廣的思想、文化、書寫方式和風俗的社會改良運動。

迄今為止，關注到這一運動的學者並不少，但對其以專題的形式進行系統地考察和研究的卻並不多見。較早地注意到這一運動，並在發掘和梳理大量報刊資料的基礎上，將這一運動進行了歷史定位和文化史描述的是台灣學者李孝悌。李孝悌在其論文〈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¹⁾和專著《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²⁾中對清末白話文書寫和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都有精闢的論述。他認為，「白話文的發展，在清末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與社會運動。」³⁾此前，幾乎還沒有學者將清末白話文的發展提到如此高度⁴⁾。同時，他還強調這一運動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這麼密集而多樣的方式對下層社會做啟蒙的工作；同時也因為它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思想和社會運動——知識分子走向人民的『民粹運動』(populist movement)——的源頭。」⁵⁾他指出這一運動之所以會在清末出現，直接的原因就來自於當時知識分子日趨強烈的危機感和覺悟意識。他對這一運動發生的背景和要因有一段很簡明而又貼切的解說：

就思想的根源來說，對下層社會進行啟蒙工作的必要性，在甲午戰爭之後已經窺見端倪。我認為「開民智」的主張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候被提出來，和甲午之後知識分子普遍體認到思想改革的迫切性有很大的關係。換句話說，「開民智」的論調是在一個一般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1895 年之後，隨著新式報紙、學堂和學會的大量出現，知識階層的啟蒙運動已經從理論層次落實到實際行動；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則還只停留在少數幾個人的議論階段。但短短五、六年間，由於義和團之亂和八國聯軍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局，

使得「開民智」的主張一下子變成知識分子的新論域，「開民智」三個字也一下子變成了清末十年間最流行的口頭禪，其普遍的程度絕不下於五四時代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一般「有識之士」或所謂「志士」，深感於「無知愚民」幾乎招致亡國的慘劇，紛紛籌謀對策，並且劍及履及，開辦白話報；創立閱報社、宣講社、演說會；發起戲曲改良運動；推廣識字運動和普及教育，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民眾啟蒙運動。⁶⁾

可見，正是在清末社會普遍存在的「亡國滅種」的強烈的危機意識下，這場以「救亡圖存」和「開民智」為目的的啟蒙運動纔得以持續十年之久。義和團之亂造成的清末危局和大面積顯露出來的下層社會民眾愚昧無知的普遍現象，使得「有識之士」痛感「開民智」、「啟愚民」的重要性，他們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下層民眾社會，並自覺參與其中，由此，纔使知識界少數思想家的言論「頃刻間轉化成一場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也為中國現代史上的民粹運動寫下動人的第一章。」⁷⁾

另外一位台灣學者羅秀美，從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的研究入手，考察和探究發生在五四之前的這一書寫現象的文化背景、歷史脈絡及其近代性(modernity)意義⁸⁾。她在《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研究》一書中從科舉制度的廢除、翻譯外文著作風潮的興盛、文人白話小說的創作與商業行銷的結合，以及讀者的閱讀取向和文學的社會運行機制⁹⁾改變等方面，來梳理和分析了白話書寫在這一時期不斷拓展和興盛的諸要素。她指出，「近代文學最驚天動地的發展就是推動淺白的文體。以淺白通俗為推進下層社會的必要手段，以喚醒大眾、開通民智，使社會進步。因此，白話書寫成為當時必然的一種發展。」同時，她還認為，「進步的、革新的思想內容與通俗淺顯的形式相結合，吸引更多讀者閱讀，使得文學閱讀人口的層面漸次擴大。儘管當初為的是維新或革命的需要而書寫白話，一旦白話書寫成為必要與習慣之後，其影響層面已非當初所能想像，而近現代文學就是白話書寫的最大受惠者。」¹⁰⁾這段話對白話書寫出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了簡要明瞭的概括。在該書的〈結論〉部分，她闡述了如下觀點：「近代白話書寫現象是一次廣泛的語文改革運動，在推動書面語與口頭語合一、擴大白話的使用範圍、提高白話書寫的地位等方面，都為往後白話文的書寫提供重要的發展基礎。因此，近代白話書寫現象不只是一次文學史的奇峰突起，也是影響文化發展極為重要的變革。」¹¹⁾

顯然，無論是從下層社會啟蒙運動的具體考察入手描繪出這一運動的歷史脈絡和文化史面貌，還是在文化背景的鋪敘下論證白話書寫現象的意義和價值，兩位學者都在這一專題研究上有所突破。李孝悌的專著更是近年來在清末文化史和近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為最紮實和嚴謹的學術成果。與此相比，羅秀美在資料徵引方面略顯不足，有些資料直接轉引自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一書¹²⁾。這可能和她一個相對短的時間段裡投入這一課題研究有關。此外，像我後面還要提到的在清末的白話報刊上經常可見的一種書寫現象，即將文言「演述」或「演俗」為白話¹³⁾，這其實是由文言向白話過渡期的一個特有的書寫現象。該書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這一點令人遺憾。

我將這兩部專著放在一起談，一方面是因為這兩部書比較集中地考察和論述了清末這一時段的白話書寫和啟蒙運動；另一方面則是藉此探討一下「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和「白話書寫現象」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更為準確地給這一運動下一定義，談一點看法。

首先，我認為如果從白話書寫的歷史發展和演變來看，將「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看成是「一次廣泛的語文改革運動」不無道理，但這一書寫現象何以在這一時期大規模出現，它顯然與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有關。正如李孝悌在該書中多處提到的「禁煙運動」、「戲曲改良運動」和「反纏足運動」¹⁴⁾等一樣，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這場下層社會啟蒙運動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與「禁煙」、「戲曲改良」、「反纏足」等運動相比，「白話書寫」應該是啟蒙運動中最為突出和持久的運動，它與其他運動相輔相成，互為推進，並發揮了別的運動無法替代的作用。因為無論是官方的文告、傳單，還是民間的演講、曲詞、歌謠和白話小說等，都離不開「白話書寫」這種最為有效的啟蒙和普及方式，所以，我主張在「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的定義之前應加上「白話」二字。這樣定義纔更為貼切，也更符合這場啟蒙運動的實際。

其次，這場發生在清末下層社會的白話啟蒙運動是以「開民智」、「啟愚民」和「改良社會」為主旨，它和康有為、梁啟超等領導的「戊戌變法」運動不同，既沒有具體的統領全局的領袖式風雲人物，也沒有像五四白話文運動那樣，以《新青年》為中心，由胡適和陳獨秀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之類的振聾發聵的文章和宣言¹⁵⁾，而是由眾多的讀書人和有識之士自覺地參與和推動的。在其發展過程中，雖有清朝政府和地方官吏的介入，或頒布條例、告示等予以支持和扶植，或加以警戒和阻撓，但由於白話啟蒙運動本身具有思想、文化、書寫方式和風俗的「改良」性質，而非以「革命」和「排滿」為目的，因而，清朝政府在清末推行的一些「新政」¹⁶⁾舉措，如「戒纏足」、「禁煙」、「禁燒紙陋習」等勸諭、禁令和告示等，都對這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和正面影響。

再次，清末的下層社會白話啟蒙運動的最主要的收穫就是大量的白話報刊創辦，並出現了一股辦白話報刊的熱潮。「白話書寫」被越來越多的作者和讀者所接受，一些白話報刊為了迎合讀者，還將一些外部來稿和邀稿的文言文章都「演述」或「演」成白話文來發表。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清末的白話報刊的競相創辦和白話書寫的蓬勃發展，以及廣大讀者對白話書寫形式的普遍認可和閱讀適應，那麼，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和白話文學的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一些新思想、新觀念和新知識在這一白話啟蒙運動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特別是『國民』觀念和愛國的思想——的傳播，也是這個運動的主要收穫。」¹⁷⁾此外，像勸戒鴉片、戒纏足和新式蒙學教科書的出現等，都成為了這一運動的標誌性成果。

本文以四川成都的《啟蒙通俗報》為例，來探討一下清末的下層社會白話啟蒙運動的內容和意義，並且試圖為描繪和展現這場白話啟蒙運動的歷史全貌提供一個新的側影和面相。

二

《啟蒙通俗報》創刊於1902年2月（光緒28年正月），是由四川著名的文化人士傅崇渠（1875-1917）創辦和主編、成都圖書局（又稱傅氏圖書局）印行的白話報刊。它是清末的下層社會白話啟蒙運動中出現較早的一份報刊，也是四川省創辦最早的白話報刊¹⁸⁾。

《啟蒙通俗報》原名為《啟蒙通俗書》，從第二期起改名為《啟蒙通俗報》¹⁹⁾。該報創刊之初，原計劃出半月刊，每月兩期，全年共出二十四期，但由於印刷等多方原因，出刊不久即出現了拖期現象，最終未能實現預設的目標。²⁰⁾1903年6月《啟蒙通俗報》刊出第十四期，並從該期起由半月刊改為月刊²¹⁾。在該期的〈本報改良廣告〉中，編者有如下說明：「本報原於啟蒙通俗未加分別，茲特剖而為二，以便推廣學界，加增篇頁，力求進步」。如刊名所示，將原來的內容分為「啟蒙類」和「通俗類」。「啟蒙類」的內容四門，首論說，用淺顯文辭以期雅俗共賞，於環球大勢、學界思想佔一分子；次叢書，搜集新著，編演課本，門戶各分深淺備具……；又次，摘報輯錄中外各報要事、精論，以供採擇；又次，詩歌，籍以勸學勵志，激發精神」。「通俗類亦容四門」，也分論說、叢書（介紹農工商業新書、小說等）、蜀事、中外新事等欄目。其宗旨為，「本報志在開通，顧名思義，概用淺說白話，庶使盡人能知不過啟蒙，稍涉莊雅，通俗不慚鄙俚。並恪守宗旨，不談國政官事」。這和創刊號上標榜的「本報不臧否人物，不排議政事，專以啟蒙通俗為主」²²⁾的說法並無二致。另外，該刊從這一期起改由文倫書局²³⁾鉛字排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為石版刻印，並且還擴充了雜誌的篇幅，由原來的四、五十頁增至一百一十多頁。零售價格也由原來的每期一角改為兩角。

此後，《啟蒙通俗報》又在1903年12月第十九期做出了內容和形式的調整，並刊出〈第二年本報改良告白〉，稱「本報為中下等人說法，文義淺顯，兼列白話；本報內容分七等，而門類甚多，約五、六十篇為一冊」²⁴⁾。並註明每月出一期，全年共出十二期。經過這兩次改良之後，《啟蒙通俗報》不僅確定了「啟蒙」和「通俗」的刊物品格，明確地規定了「概用淺顯白話」和「兼列白話」的書寫形式，而且還將讀者對象定位於社會的中下層民眾。

1904年3月出刊的《啟蒙通俗報》，標明為「第二年第一期」，並不再分為「啟蒙」和「通俗」兩類，而是將二者合而為一。每冊的價格由兩角漲至兩角五分。我見到這套雜誌的最後一期是1904年12月（光緒30年11月）出刊的第八和第九期的合刊號，估計這一合刊號很可能就是該刊的終刊號。《啟蒙通俗報》停刊的原因不詳，除了官方報紙《四川官報》登場所造成一定影響外，經費周轉困難導致停刊的可能性最大。²⁵⁾

《啟蒙通俗報》的館藏情況不佳，一些大型的近代期刊辭書中都沒收該辭條，有的即便列入辭條也多所誤記或過於簡略。²⁶⁾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國內外尚未發現保存完整的《啟蒙通俗報》。據我所知，國內館藏最多的是成都的四川省圖書館，它藏有這套雜誌「第一年」的第五、八、十二、十七、十九期，「第二年」的第三、八九合期，共八冊；上海圖書館藏有「第一年」的第一至第三期；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第二年」的第三期。此外，海外館藏最多的是日本京都大學附

屬圖書館。1999 年我在該館書庫的「未整理註冊」的舊期刊中發現了《啟蒙通俗報》²⁷⁾，共七冊。其中有兩冊和國內館藏重複，其餘五冊在國內已經無法找見了。

近年來在搜求、整理和閱讀《啟蒙通俗報》的過程中，我對這份雜誌的創辦人傅崇渠和雜誌內容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時，還通過這份雜誌對這場清末下層社會的白話啟蒙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關於《啟蒙通俗報》的創辦人傅崇渠，在中國的一些大型近現代人名辭典和清末民初人物傳記類工具書中幾乎都沒有收入有關他的詞條，個別辭書雖列有詞條，但過於簡略，且誤記較多²⁸⁾。記述較為詳細的是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文史館編纂的《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續編》一書所收吳紹伯和林松柏的〈開拓民智的先驅者傅樵村〉²⁹⁾一文。其中雖有一些誤記和遺漏，但基本的記述都有據可考。筆者參照此文，將傅崇渠在創辦《啟蒙通俗報》之前的簡歷和文化活動做了如下勾勒。

傅崇渠生於 1875 年（光緒元年），是四川簡陽石盤鄉人，字樵邨，也作樵村，別號新樵、樵父、樵夫、熱心冷官和新樵子等³⁰⁾。傅崇渠的父親傅廷璽是清道光年間舉人，曾任過江安、瀘州縣教諭，卸職後返鄉辦學。傅崇渠幼年時曾在父親的指導下讀四書五經。他生性聰穎，喜博覽群書，尤其對歷史和地理類書籍更是傾心鑽研。這為他後來編撰多種歷史叢書和繪制數十種專題地圖³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傅崇渠青年時隨父親遷居成都，此後他的一生都在成都度過，故而在他撰寫的被譽為詳盡、真實地再現了清末成都社會「百科全書」的《成都通覽》³²⁾一書中，他以成都人自稱³³⁾。傅崇渠二十一歲時作了廩生，1898 年進四川最高的官辦學府尊經學院學習。同年，康、梁發起了「維新變法」運動，這場震驚中外的變法運動對年輕的傅崇渠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思想開放、有見識，對提倡西學和關心時務表現了極大的熱情，而「開民智」和「救亡圖存」也成了他終生矢志不渝的信念和追求。1901 年他在成都桂王橋北街三十二號傅氏公館裡開辦了成都圖書局，還開設了算學館。1902 年他和總教習蘇星舫合辦了成都的第一份傳播科學知識的雜誌《算學報》，因銷路不好，僅出二期後便停刊了³⁴⁾，但這份報刊的創辦和編輯嘗試為他後來獨自創辦《啟蒙通俗報》提供了很好的經驗。

傅崇渠對新生事物特別敏感，且敢開風氣之先。他在公館門口掛了多塊招牌，有閱報公所、圖書局、印刷所、通俗講演所、蒙養小學堂、省外書報的代派所等，同時還兼營茶鋪和住居，使他的公館人來人往，非常熱鬧。據說，他最早在公館門口掛出的牌子是「閱報公所」，他收集了全國各地報刊六十餘種，還有兩種日文報紙，免費供人們閱覽。³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清末的成都傅氏公館已經成了最早推進白話啟蒙運動和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的重要陣地。1902 年 2 月（光緒 28 年正月）傅崇渠創辦了以「開啟民智」、「淺說白話」為標誌的白話報刊——《啟蒙通俗報》，並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身到了白話啟蒙運動之中。

《啟蒙通俗報》由半月刊改為月刊後，內容和形式都相對穩定了，基本上每期都有論說、中外歷史、中西新事、蜀中新事、叢書、雜錄、歌謠、圖畫、教科書講義等欄目，其中，中外歷史都

用白話演述，和新式蒙學教科書一樣，採用連載的方式，既可將其作為雜誌來閱讀，又可等連載結束後拆開再裝訂成書。³⁶⁾ 傅崇渠從自身做起，身體力行用淺顯通俗的白話來撰寫論說，演述中外歷史史話，編寫歌謠，譯介日本蒙學教科書，介紹國內外和省內時事新聞等。從現存的《啟蒙通俗報》來看，有好幾篇論說都出自傅崇渠之手，並且這些論說都很好地體現了清末下層社會的白話啟蒙運動的內容和主旨。

《啟蒙通俗報》在當時受到四川文化界人士的歡迎，也得到了四川總督岑春煊的聲援和支持，岑制臺還將自己撰寫的白話文告〈勸人莫包腳〉和〈開辦四川警察告示〉的傳單發表在該報上。³⁷⁾ 北京、天津、上海、漢口、杭州、江西等很多省市都有代派處和辦理讀者郵購，還有外國傳教士、外國人教習和外交官員等購買，甚而遠銷海外。據該報記載，發行部數最多時超過了一千部³⁸⁾，在當時曾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三

如前所述，在《啟蒙通俗報》登場之前，全國的白話報刊僅有十餘種之多，在四川該刊為首創。與其同一時期或稍後的幾年間，白話報刊猶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地湧現出來。這和戊戌變法特別是庚子事變之後清末的社會背景有關，也和先覺的有識之士們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共識」有關。即使在是「革命」、「排滿」，還是「改良」、「立憲」上，革命派和維新派存在著重大的立場和主張的分歧，但在「開民智」、「啟愚民」和鼓吹發動啟蒙運動上卻有著一致的、無可爭辯的共識，儘管二者要達到的目標並非一致。而這一共識與清朝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舉措相合拍，這些要素加起來，正是這場下層社會的白話啟蒙運動最終收到了一定成效的重要保障。《啟蒙通俗報》在體現這一共識和倡議與推動各項啟蒙舉措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首先，《啟蒙通俗報》將閱報和廣見聞、增智識、進學問以及「整頓精神」、做「有用人材」的目標聯繫起來，大力宣傳閱報的益處。

傅崇渠在《啟蒙通俗報》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論看報才知時務〉的文章，開宗明義，列舉閱報的益處。文中說：「自從開有報館，見識淺的人，看了報，他遂添了許多的見識，就是那見識廣的人，看了報，他更長了許多的見識。不必出門，即在家下，天天看報，不怕幾萬里的事，樣樣曉得。你看快樂不快樂，有益不有益？……無論皇上的新政，百好的新事，各國的新法，只要有益於民的，有關於教養富強的，一齊報上，看報的人，有士有農有工有商，知道各處要緊的事，盡是莫有聽見過的，所以個個說有益，人人都愛看。……見聞從此廣了，智識從此開了，學問從此進了，全靠報的功勞。第一是增見聞。大凡人的耳目，多半不廣，除了出門，不曉得他國的事，如今有報，把往天莫有看到的，莫有聽到的，一齊領會在心裡了。第二是識時務，……看了報，就把各國的新政要事，全然曉得。……第三是便商人，大凡做生意的，總要信息靈通……第四是益學問，一切新印書籍，新得學問，新出法子，看了報，就可以感動興起，並可以補我不足。這四件都是看報的好處，

其餘好處尚多，說不完……讀書是知古的學問，看報是知今的學問。我願有志氣的人，每天在讀書外，看點有學問的報。把從前迂拘的見識，頑固的習氣一概除了。整頓精神，操練功夫，作有用人材，豈不好麼？」³⁹⁾

傅氏的這篇文章用淺顯的白話將道理闡述得十分明晰易懂。他從四個方面談到讀報的益處，強調「讀書是知古的學問，看報是知今的學問」，常言說的「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已經不能適應當今，而要知天下事，就不能不讀報。光讀書不看報，只能通古而不能博今。明確表現了傅氏力圖通過勸人閱報來增加新的「時務」知識和學問、掃除陳舊的識見和風氣的啟蒙思想。兩年以後，陳獨秀在蕪湖創辦了《安徽俗話報》，他在〈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一文中也強調讀報與獲取信息的重要。他寫道，即便是再優秀的讀書人，如果「坐在家裡，沒有報看，好像睡在鼓裡一般，他鄉外府出了倒下天下來的事體，也是不能夠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國的兵，都已經佔了北京城，我們安徽省徽州、穎州的人，還在傳說義和團大得勝戰。那時候若是有了這種俗話報看，也可以得點實在信息，何至於說這樣的夢話呢？」⁴⁰⁾這一說法和傅崇渠的論說相當接近。

發表在《啟蒙通俗報》第五期上的〈看報有益說〉（臥雲室主人演）一文與傅文相呼應，從中外對比的角度，將看報與國人自省、與國富民強的大目標聯繫起來，強調看報的意義。該文的最後一段寫道：「曉得人家強，纔曉得我們弱；曉得人家富，纔曉得我們貧；曉得人家聰明，纔曉得我們愚蠢；曉得人家團結，纔曉得我們渙散；曉得人家有禮，纔曉得我們胡鬧；曉得人家有志氣，纔曉得我們無振作。故要想中國強，不可不看報；要想中國富，不可不看報；要想中國的人都聰明，不可不看報；要想中國的人都團結，不可不看報；要想中國的人都有禮，不可不看報；要想中國的人都振作，不可不看報。」⁴¹⁾總之，閱報關乎國富民強，關乎中國人素質的普遍提高。似乎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有意思的是，這段文章用了一連串的排比句，句式和風格頗似梁啟超的「新文體」。《啟蒙通俗報》在第十七期上還刊有傅崇渠以「新樵」筆名發表的論說〈四川開官報說〉，為這份新登場的官方報刊做宣傳⁴²⁾。

其次，傅崇渠在《啟蒙通俗報》上還發表了一些勸戒惡俗陋習，如戒煙、戒纏足、戒嫖賭、戒習神拳等論說文和白話歌謠，用來配合和推動白話啟蒙運動的深入展開。他編寫的白話歌謠易唱易記，收到了很好的反響。如〈勸戒纏足俗歌〉，後來還在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附張》第六百八十九號上轉載。詳引如下：

中華女子無教育，二萬萬人皆纏足。纏足女子如刑人，別足非刑無此酷。男女同是爹娘生，何苦待女太刻薄。女兒不及男兒尊，男兒嘻嘻女兒哭。女兒不比男兒強，女兒悽悽男兒樂。男兒有足逍遙游，女兒無足不束縛。號泣痛楚母不聞，女兒疼痛娘隔膜。任他朽腐與痺痿，那管剝膚與刺肉。好像母女如寇讎，要她雙足站不著。好像母女有大冤，要她雙足不活潑。好像女兒如大盜，使她殘疾羈卡獄。好像女兒如豺狼，使她就縛防動作。哪知阿娘待女心，其心更比盜賊毒。哪知阿娘撫女心，其心更比豺狼惡。不知因愛反成仇，一心祝筭莫成竹。

反說阿娘愛女深，纔將女足加約束。反說阿娘望女成，纔將女兒足裹熟。忍心害理喪天良，女罪千金不可贖。女兒何必怨阿娘，娘足當初一樣縮。毀傷形體誰忍心，腳不包纏理不合。此俗自古已相沿，腳不包小受人辱。希圖好看賊公理，只知包足不知學。養育子女在善教，豈在足小償人欲。不講婦德與婦功，專講金蓮三寸曲。多少功夫做不成，猶如醜了眾家族。你說足大無人要，何以外國皆大足。你說大足不好看，何以旗人無此俗。我看日本博物館，尖足擺在標本屋。指拇縮曲如削尖，皮如白苔長如笏。沒有買鞋沒布纏，現它原形羞我目。又在東洋博覽會，人類館中去一矚。五大部洲人樣齊，各種風俗都做出。中國女子三四人，裙下雙鉤著紅絲。看見華人面發羞，怕人笑他如豬畜。藏藏躲躲足不停，足如銀鑊加桎梏。中華婦女不值錢，外洋拿去當奴僕。醜態畢露任人觀，惟有華人額皆蹙。家有女兒且讀書，不須包足自求弱。強種強族在此舉，我作俗歌當忠告。⁴³⁾

這首歌謠言詞懇切，表達酣暢淋漓，傾訴了作者對封建社會加於婦女殘害的深切同情和對女性的人格尊重，對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實提出了質疑，譴責「希圖好看賊公理」的纏足惡俗。同時，作者還把自己去日本參觀博覽會和博物館時親身所受的屈辱感受和衝擊寫了進去，「沒有買鞋沒布纏，現它原形羞我目」、「醜態畢露任人觀，惟有華人額皆蹙」，疾聲呼籲戒纏足，給讀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啟蒙通俗報》第一年第十五期還在「蜀事」一欄介紹了重慶一些有識之士組織的「天足會」，文中說：「丁酉年冬間，重慶潘梧岡先生、梅黍雨先生、江津許見田先生創立天足會，已勸有千餘人不纏腳。後來戊戌政變，立會犯禁，又復停辦。現在風氣開了，從前會友集議……又於四月初十日開會，共舉總董八人……分董二十餘人。分頭勸導，其宗旨將來會中人等，彼此可結婚姻，免得人怕不纏腳，不便結親。所以訂有會中人，若娶了小腳媳婦，當受重罰的專條，又開一個女學堂，將來女子家，都是不纏腳、能讀書的，豈不可貴？」⁴⁴⁾可見，傅氏對戒纏足這一運動一直非常關注，並利用雜誌熱心地為其做鼓動宣傳。

另有一篇〈勸人莫習神拳歌〉（作者不詳），也是取自庚子事變後「神拳」活動在四川等地繼續蔓延的現實題材，具有強烈地反迷信和「啟蒙救亡」的現實意義。這篇歌謠純用白話書寫，讀起來朗朗上口，很適合於給不識字之人誦讀和宣講：「諸君聽我苦口說，勸你神拳不可學。人道此拳能保身，我道此拳害殺（煞）人。前年山東起拳匪，直隸居民受大累，一朝上陣法不靈，可憐都作無頭鬼。今年餘黨來四川，死灰又想從頭然（燃）。每人傳習一張紙，不費時日不花錢。幼孩婦女皆入會，一網打盡真可畏。都把邪術當神通，自言不怕鎗砲轟。能降觀音與佛祖，能降八戒孫悟空，能降華佗治疾病，能降諸葛與關公，關公大刀孫猴棒，神來舉動如戲上。誰個親眼見古人，戲中都是假模樣。明知造反不從他，便說習來保自家。官司拏著辦得慘，破產丟命悔不轉。明知衙門在緝捕，便說會算拏不住。近來捉了許多人，好人都被歹人誤。明知到官就要斬，便說日子未學滿，學滿者少未滿多，受盡官刑神不管。明知北京短了嘴，便說這回有神水，神水解穢未可知，一到戰場悔也遲。北京之人受害大，當初也信這些話。事到臨頭纔看穿，已是騎虎不能下。……無錢之

人問了斬，有錢還要傾家產。鄰居因此受累深，家家切齒豈甘心。更有株連替死鬼，含冤找你真拳匪。若要不知須莫為，……細思本是善良民，學拳只為避刀兵，如今學拳命難保，滋事又有官軍剿，一砲兩砲擋不住，從此進退皆死路。……不如回心聽人勸，依然改過為良善。焚毀妖書與符咒，不聽妖言來引逗。……小子亦是川中生，不辭饒舌勸鄉人，也知殺運難躲過，救得一個算一個，請君聽我勸戒歌，大家歡喜無風波。」⁴⁵⁾ 這首〈勸人莫習神拳歌〉比川督趙爾瑒寫的抨擊死灰復燃的義和團和紅燈照、勸人莫習拳的〈勸民醒迷歌〉⁴⁶⁾ 早了五、六年左右。歌謠以層層遞進的說理方式勸人不可受妖人蠱惑，輕信謠言，以致被神拳所害，最終走上不歸路。

《啟蒙通俗報》第一年第十四期至十七期上還連載了一篇白話小說〈拳匪之原神出現〉，署名為「住第二世界人撰」，內容也是揭露拳匪利用迷信活動妖言惑眾，騙人錢財，勸人莫習神拳。故事講述了庚子之亂時一個拳匪軍師從北京逃到四川後，夥同一些偷雞摸狗的地痞無賴、不務正業的落第文秀才等假扮活菩薩等，借迷信活動四處招搖撞騙。今天造謠言，明天操神打，後天攻教堂，遇著響頭糧戶，便殺人搶錢，鬧得沸反盈天。由於鄉民愚昧迷信，受這些人矇騙，還一群一群地來敬活菩薩。最後，這夥假扮的活菩薩、活孔明、活靈官等人均被四川新到的清正大員給繩之以法。小說描寫的就是這樣一場裝神鬧鬼、搞迷信來騙人錢財的醜劇，其中人物姓名都用諧音，如包振爛（正爛）、胡鬧、鄭佩石（正陪死）、宋死（送死）、宋命（送命）、余人（愚人）等，也可見這篇小說的特點。據《大公報》1902年8月29日載一則關於四川省拳匪的報道，和該篇小說內容有些相似。報道距城三十里處有一龍潭寺，鬧起拳匪之亂，匪首是廖菩薩。這篇小說的主旨和〈勸人莫習神拳歌〉是一致的，都是以實現「啟愚民」、「開民智」為目的，強烈地反迷信。有學者認為這篇小說「真正的用意卻在於攻擊、誣蔑義和團的反帝鬥爭。暴露了其對農民革命運動敵視的態度」⁴⁷⁾。我認為這明顯是用正統的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解讀曲解了這篇小說。

《啟蒙通俗報》第二年第4期（1904年6月）還刊出一組《醒國歌謠》，有署名松琴的〈女學生入學歌〉、雪友的〈新少年歌〉和龔大令（開晉）的〈勸學歌〉，這幾首歌謠都是用淺顯易解的韻文，宣揚新的價值觀和呼籲接受新式學堂教育、支持女學生入學等，如〈女學生入學歌〉開篇就宣稱：「二十世紀女學生，美哉新國民」，勉勵女子入學堂、學新知，「姊妹相隨蹤，勵志願作女英雄」。〈新少年歌〉寫道：「新少年，入學堂，發達初基貴善良。先智識，後文章，眼界方針五大洋。種族由你保，中國賴你強。國民義務各擔當，新少年勿荒唐。新少年休草草，五洲萬國競強校。瓜分逼人要防好，為奴為隸如何了？……少年少年各努力，今古英雄爭自立……」。歌詞鏗鏘有力，情感飽滿激昂，有力地傳達出了處於風雨飄搖、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老大帝國子民對中國「少年」的期許和熱望，讀後令人振奮，它和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⁴⁸⁾ 有異曲同工之妙。〈勸學歌〉詞意懇切，力勸民眾：「閱報紙，識時宜，開人耳目廣人知。造民材，興民業，要使富強人莫敵。民業盛，國富充，人材又足建殊功。我中華，嗟獨弱，年年賠款輸不足。苦民力，困難紓，眾須鼓勵莫躊躇。自去年，奉朝旨，諭民篤學從今始。將學務，急更張，京師先立大學堂。各行省，各州縣，催督學堂處處建。變科制，改試程，八股試帖皆不行。要實學，瞻才智，總期有用能匡世。」勸人要接受

新知識和新學問，不要對八股試帖抱有幻想，「莫觀望，莫遲疑，八股萬難復舊規。多讀書，廣閱報，胸中要有真材料。教童子，亦改章，又設蒙學遍各鄉。」

再次，傅崇渠還在《啟蒙通俗報》上發表了一些論在西學東漸之背景下怎樣理解中學和西學以及如何處理中西學之關係的論說文章。如〈勸人學西學要先實在學孔子〉（東瀛四民參撰）、〈習西學要拏中學立根本說〉、〈華人技藝不如西人論〉⁴⁹⁾等文章。除了署名文章外，很可能都出自傅氏之手。其中〈習西學要拏中學立根本說〉一文主張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⁵⁰⁾，強調中學和西學二者不可偏廢，「華人不能不習西學，又不能盡廢中學」、「不學西學，不能補中國，盡廢中學，不能立本根」。在當時這一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還建議學習洋字洋話最好在十五歲以後，在此之前「要習中學，使他理解清澈，立個根基」。從蒙學和外語教育的角度來說，這一話題很有意思，但不知這一說法從何而來有何根據，作者並沒有展開。

最後，《啟蒙通俗報》還利用了小說這一最有效、最便捷、也最受歡迎的民間通俗文學形式，以期吸引讀者。所載小說除〈拳匪之原神出現〉和〈法郎剋令〉⁵¹⁾外，大都非原創，而是轉載其他報刊已發表或已出版的作品。如《泰西說部的毒蛇案》、《泰西說部的寶石案子》、《拔斯夸姆命案》等，這幾篇小說均為英國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當時頗受讀者歡迎，均轉載於1901年由啟明社出版的《泰西說部叢書之一》一書⁵²⁾。在《啟蒙通俗報》第二年第七期上還轉載了李伯元的白話小說《活地獄》，但只載了兩期，未完。⁵³⁾

四

與同時期或稍後陸續登場的白話報刊不同的是，傅崇渠還有意地將《啟蒙通俗報》當成蒙學教科書來編，突出其重視新學問和蒙學教育的特色。正如他在第一期上發表的〈啟蒙通俗書的章程〉中，對「啟蒙」和「通俗」之義所做的說明，該報「是專為小孩子起見，所以叫做啟蒙，又為平常百姓，字墨不深的人起見，所以叫做通俗。又為中國風氣未開，小孩子不知道學好，俗不可耐的人，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做老師的，不知道教徒弟的法子，做父兄的，不知道教子弟的方子，我們才出這書。」⁵⁴⁾也就是說，如何傳播新的知識和學問，特別是和傳統的「四書五經」不同的新式「蒙學」，學生該學什麼，老師該教什麼以及如何教，都是《啟蒙通俗報》面臨的，同時也願意研討和承擔的課題。於是，在傅崇渠的獨特的發想和努力下，《啟蒙通俗報》在「講學問」和「正蒙學」⁵⁵⁾方面形成了該雜誌獨到的品格和特色。

《啟蒙通俗報》先後刊載了《西學訓蒙三字經》（署「成都樵新子校刊」）和新式國語教科書《讀書入門》這兩部重要的蒙學教材。前者刊於1902年5月第三期和同年7月第四期上；後者從1902年10月第七期開始連載，至1903年7月第十五期止。這一時期，隨著甲午戰爭的敗北和庚子事變慘禍的發生，朝野上下要求廢科舉、興學堂、開民智的呼聲越來越高。清政府迫於內外壓力，於1902年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初步規定了各類學堂系統的辦學宗旨、學堂管理、課程

設置、學堂建置、學生要求及教習選任等各種規則，新式的蒙學教育由此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一些有識之士除了從西學中引進新的課程和教材，如格致、聲光、電化、算學、天文和地理等，還著手編寫歷史、國語等蒙學教材。一些報刊雜誌也將蒙學讀物作為思想啟蒙、普及和擴展新知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西學訓蒙三字經》和《讀書入門》就是這批蒙學教科書之一，自然也帶有這一時期蒙學教科書的一些特點。《西學訓蒙三字經》仿照《三字經》的形式，依次介紹了南北半球、五大洲和世界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傳播了世界地理知識，而且對中國正面臨著帝國列強覬覦和瓜分危險提出了警告。該教材並具有言簡意賅、易記易誦的特點，是清末蒙學教科書中模擬和改編《三字經》的教材中較為成功的一部。《讀書入門》全書為七十五課⁵⁶⁾，從書寫形式上看，基本上是文言，也有一些文白相間的句式，總體較為文雅，個別句子還有些艱澀和拗口，但句式較為整齊，大都有對偶和押韻，適合於朗讀和背誦。內容多為由淺入深地傳授自然科學和社會生活的各種常識和新知。由此也可見，清末出現的一批蒙學教科書已經顯現了編寫者試圖從以科舉應試為主軸的傳統教育體系和知識結構中跳出來，為普及國民新知和開啟民智所作的努力。關於這兩部蒙學教材，詳細可參見拙著〈從清末的蒙學教科書看近代國語教育草創期的特色——以《西學訓蒙三字經》、《讀書入門》為例〉⁵⁷⁾，故不贅述。

此外，《啟蒙通俗報》還刊載了一批蒙學教科書，大都採取連載的形式。如《小學體操》、《類字集》、《學校衛生講話材料》、《師範新講義》、《心算一見曉》、《中國輿地三字經》、《教育白話講義》、《小學體操》等蒙學教科書⁵⁸⁾。這些新式教科書有的是傅崇渠自己編撰的，有的是他於1903年3月以成都文化界代表的身份赴日本大阪參觀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時購買帶回來並譯成中文的日本教科書。⁵⁹⁾像《小學體操》等教材，為便於讀者理解和教師作為教材使用，傅崇渠還配以插圖來說明動作要領，使人一目瞭然。此外，他還將中外歷史演述成淺顯易懂的白話發表，如他撰寫的《三國白話史》、《晉白話史》、《南北朝白話史》、《唐朝白話史》和《北宋白話史》等都是作為新式歷史教科書而編寫的。傅崇渠還寫了〈勸學心算說〉⁶⁰⁾一文，推廣新式的「心算」法。

值得一提的是，《啟蒙通俗報》還有一些專門介紹自然科學知識的內容，如連載於第一年第十四期至十九期的《蠶桑說法》和連載於第二年第一期至第四期的《博物學問答》等。在該雜誌第二年第四期的「新智識新思想記二」中還將從各家報紙搜集到的有關自然和科技的奇文軼事、機器發明等作了「專題」介紹，其中有鐵線艇、坭造煤、避蚊樹、電花生、傳力繩、全體機、海底界、空氣船、黑變白、無線電、新原質（厘地詹）、明目器、無聲炮等。由此也可見，傅氏在大力提倡破除封建迷信的同時，還非常關注科技知識的普及和對西方新的科技信息的介紹，將「啟愚民」和「開民智」口號落實到實處。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對《啟蒙通俗報》內容的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由於我們以往對五四運動的過度評價，使學界有意或無意地割裂了清末的白話啟蒙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連貫和延續性，妨礙了我們對清末的白話啟蒙運動的正常估量和準確評價。其實，在我發掘和整理清末白話

啟蒙運動的資料過程中，我明顯地感到，這裡埋藏著大量的豐富的礦藏，僅僅是將其如實地展示和勾畫出來，那麼以往那些貌似權威的結論就很難站得住腳。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調查和整理《啟蒙通俗報》的工作，不僅使我們對清末的白話啟蒙運動在四川成都這一地域的展開狀況有了新的了解，同時，也從一個側面為更清晰、更準確地描繪清末白話啟蒙運動的全貌和進一步探討這一運動的內容和意義提供了實例。

註

- 1) 李孝悌〈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1年5月。
- 2)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98年3月第2版。
- 3) 同注1。頁18。
- 4) 對清末白話運動和五四的白話文運動之關係，有很多研究者給予了關注，並注意到二者的繼承和發展之關係。如譚彼岸《晚清的白話文運動》〈前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指出：「晚清白話文運動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驅，有了這前驅的白話文運動，五四時期的白話文才有歷史根據。」（頁3）、陳萬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一書中有一節〈清末的白話文運動〉，其中有一段重複了譚彼岸的論述，肯定「清末的最後十年，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白話文運動』」並且指出，「白話文運動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環節，更直接的說，是點燃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火炬。」（頁131）。李孝悌在〈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一文中延續了上述主張，並進一步指出，「清末的白話與五四的白話並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發展，而是一個延續不曾斷絕的新的歷史動向的產物。」（頁20）。
- 5) 同注2，頁6。
- 6) 同注2，頁11、13、14。
- 7) 同注2，頁14。
- 8) 關於「近代性」，作者解釋為「指的是白話書寫於近代文學史上所展現的特殊時代意義。換言之，白話書寫現象是古典中國文學走向現代中國文學的轉捩點，也是傳統文言文書寫逐步邁入現代白話文書寫的關鍵時期。在近代白話書寫現象之前，文學的書寫媒介就是文言；而近代白話書寫的呼聲四起之後，文學媒介則是文、白並呈的局面、白話書寫並未迅速成為一般大眾習以為常的書寫媒介。此期，白話書寫現象，並不完全等同於五四白話文運動時期的白話書寫，更不與現代白話書寫的習慣相同。此時的白話書寫，具有它特殊的質性。」見羅秀美《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研究》（臺北，萬象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3月），頁19。
- 9) 這裡所謂「文學的社會運行機制」作者解釋道，「指的是新型傳播媒體（報刊）和平裝書（相對於線裝書）的問世，機器印刷和商業化的銷售方式，逐漸成為文學文本的製作與傳播的主要方式，使得傳統知識份子壟斷文化的局面漸次瓦解，『市場』成為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讀者反應成為文學價值的重要評斷標準。因此，文學逐漸走向以大眾反應為主的閱讀世界中」，同上注，頁73。
- 10) 同上注。頁79~80。
- 11) 同上注。頁325。
- 12) 羅秀美在對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的例證上多次轉引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一書中引用的《大公報》上的資料，如果從「白話書寫現象」的角度翻看一下這些報刊，相信會有很多好資料可以徵引，這一點不得不說是這本專著的致命弱點。
- 13) 在清末報刊上經常可以在作者署名處看到某某著，某某「演」或某某原著，某某「演俗」的字樣，或者直接標某某「演述」、某某「演」，這說明原文為文言，由某某「演」或「演述」為白話。因為白話書寫不

- 是誰都可以寫的，需要一定的適應階段。因而，這一時期的白話報刊經常請一些擅長白話書寫的人，如歸國的留學生等，將投稿的文言文改寫成白話。梁啟超 1902 年和羅普將森田思軒日譯本的《十五少年》譯成中文時，起初擬純用白話翻譯，但譯速甚慢，遠不如文言得心應手，結果譯了三章後又改為「參用文言」，使翻譯進度由每點鐘僅能譯千字增加到二千五百字，提高了一倍半還多。梁在第四回的〈譯後記〉中感慨系之：「譯者貪省時日，只得文俗並用。明知體例不符，俟全書殺青時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見，語言文字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梁說的是實情，對於晚清一代文人來說，文言畢竟是她們最為熟悉的書寫方式。由文言的書寫到半文半白，再到純白話的書寫，實非易事，實際上是經歷了從清末到五四這一長達十多年的轉變過程的。詳見拙著，〈從森田思軒譯《十五少年》到梁啟超譯《十五小豪杰》〉，《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38 號（2002 年 12 月），頁 5。
- 14) 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中提到上述各種「運動」，但都應該屬於整體的大規模的清末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的一部分或一個階段。
 - 15)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載《新青年》第 2 卷第 5 號（1917 年 1 月）、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第 2 卷第 6 號（1917 年 2 月）。
 - 16) 清末「新政」涉及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在文化上，如下令廢除八股文，停止武科考試（1901 年宣布），後又於 1905 年廢止科舉考試；發佈諭令禁纏足，要求纏足的放腳（1902 年）；1906 年清廷諭令《禁煙章程十條》，禁煙禁毒。此外，還有開辦各地的警察署、興辦新式學校、推行新學制、設置新課程、剔除陋習、推行新的衛生觀念等，均被稱為清末「新政」。
 - 17) 同注 2，頁 216。
 - 18) 在《啟蒙通俗報》之前，約有 10 多種白話報刊問世，最早的有 1897 年（光緒 23 年）在上海創刊的《演義白話報》，此外還有《平湖白話報》（1897 年，平湖）、《無錫白話報》（1898 年，無錫。後改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女學報》（1898 年，上海）、《上海晚報》（1899 年，後改名《白話報》，上海）、《覺民報》（1900 年，上海）、《京話報》（1901 年，北京）、《北京官話報》（1901 年，北京）、《白話愛國報》（1901 年，北京）、《杭州白話報》（1901 年，杭州）、《蘇州白話報》（1901 年，蘇州）、《通俗日報》（1901 年，上海）、《圖畫演說報》（1902 年，浙江）等。《啟蒙通俗報》比陳獨秀創辦的《安徽俗話報》（1904 年）還早了兩年。參照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說年表》（大阪，日本清末小說研究會，1999 年）、劉永文《晚清小說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等。
 - 19) 《啟蒙通俗報》第 1 期稱「號」，後又稱「期」，第 5 期則稱「冊」，有「期」、「號」和「冊」混用現象，但總體來看，以「期」為多。
 - 20) 《啟蒙通俗報》第 2 期刊出〈本報告白〉，稱「近因梓人難覓，以致出報過遲」，這應該是拖刊的主要原因。
 - 21) 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記從這一期始改名為《改良啟蒙通俗報》，由史雋峰主持。然而，筆者查閱該刊只是在封二的目錄欄上出現了「改良啟蒙通俗報」的字樣，封面仍為原名。不應將其視為另外一份報刊，而且也沒有標明主持人更換為史雋峰。相反在「本雜誌義務員」一欄裡「發起人兼編纂者」仍記為「簡州傅崇渠」。
 - 22) 引自《啟蒙通俗報》第 1 年第 14 期（1903 年 6 月）。
 - 23) 文倫書局成立於光緒 28 年（1902 年），創辦人為李氏（李壽臣？- 筆者），創辦於開縣。據四川省志工礦志印刷篇編輯小組：〈關於文倫書局、成都圖書局、聚義和、成都照相樓〉一文記載，李氏「系該地名宦，曾宦遊江浙各地，知印刷業之重要。乃集資在滬採辦鉛石印刷全部用具，積極經營。……清末，遂全部移於成都之三道會館」（引自四川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12 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 年 5 月），頁 246。另據張忠《民國時期成都出版業研究》（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1 年 6 月）一書介紹，「文倫書局是成都因採用新技術而成為近代印刷企業較早的一個」。見該書頁 65。
 - 24) 引自《啟蒙通俗報》第 1 年第 19 期（1903 年 12 月）。

- 25)《四川官報》1904年3月7日創刊的旬刊報，由四川官報書局出版，是四川地方政府的言論機關，由四川總督錫良支持創辦。還有一說，是傅崇渠自己在《成都通覽》(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6年1月)中所說：「鄙人自去年彩票虧損以來，一時風氣所播，週轉不靈，舊債新連，同時併發，所負公款、私債、股本共約三萬餘金、幾致倒閉。」這一段文字最早見於傅崇渠於光緒34年10月出版的《傳樵村石印鉛印繆輶書》，可見正是由於傳購買彩票造成虧損，使資金週轉困難所致。
- 26)近代期刊收集較為詳盡的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編》(1857—1918)(上海，上海圖書館，1984年3月)、孫文光主編《中華近代文學大辭典》(安徽，黃山書社，1995年12月)均未收錄「啟蒙通俗報」這一辭條。將該辭條列入辭書的，有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辭典》(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年8月)、王章、惠中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2月)等，或語焉不詳，或記載有誤。
- 27)根據大阪經濟大學樽本照雄教授提供的信息，筆者在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書庫未整理和登記註冊的舊期刊中發現了《啟蒙通俗報》1902年至1904年間的部分期刊，共7冊。有第1年第4期(1902年7月)、第5冊(1902年8月)、第12期(1903年4月)、第14期(1903年6月)、第15期(1903年7月)、第2年第1期(1904年3月)、第2年第4期(1904年6月)。詳見拙著，《〈啟蒙通俗報〉篇目匯錄》(《清末小說》第23期，清末小說研究會，2000年12月)、頁161-172;《〈啟蒙通俗報〉篇目匯錄·補遺》(《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7號，2001年12月)、頁1-11。
- 28)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雖列有「傅崇渠」詞條，但只有短短幾行字：「四川簡陽人。名一作崇矩，字樵邨。1901年在成都建立成都圖書局。1902年，與算學館總教習創辦算學報館，出刊《算學報》。不久，因發行量少而停刊。同年，又與人捐資創立啟蒙通俗報館，出版《啟蒙通俗報》，提倡普及教育，約於1904年結束。」
- 29)見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文史館編《四川省近現代文化人物·續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 30)吳紹伯、林松柏〈開拓民智的先驅者傅樵村〉一文中提到傅崇渠的別號還有樵春、樵斧、亦天和過來人，因未見於筆者所查資料，暫不列入。詳見《四川省近現代文化人物·續編》，頁216。
- 31)傅崇渠編《三國白話史》、《漢白話史》、《南北朝白話史》、《唐朝白話史》、《北宋白話史》等白話史，還有介紹外國史的《萬國春秋》。1903年他從日本歸國後，還致力於各種地圖的繪製，十余年中他完成了《中國歷史大地圖》、《萬國通商水路新地圖》、《四川省明細詳圖》、《四川省域文明進步圖》、《春秋分圖十四卷》、《西域古今改革圖》、《考訂長江水道圖》等。
- 32)傅崇渠編《成都通覽》，又名《說成都》，共8冊，1909年(宣統元年)由成都圖書局出版。近有1987年巴蜀書社和2006年1月成都時代出版社出的復刻版。
- 33)傅崇渠在《成都通覽》的序言中稱：「予以籍於成都而說成都，較切於客於成都而說成都也。予以家於成都而說成都，較實於游於成都也。予以耳目所及者而說成都，較真於傳聞而說成都也。予以事物實錄而說成都，非以筆墨空談而說成都也。予以調查近事而說成都，不以考據古典而說成都也」，同注32。
- 34)傅崇渠在1903年10月出刊的《啟蒙通俗報》第17期上發表了〈四川開官報說〉一文，文中說：「直到壬寅年，成都圖書局稟準各大憲，才開了一個算學館，專說算學，不敢干涉地方事件。可嘆可憐，出了兩期，莫得二十個人要，此為算學報時代之四川」。關於《算學報》創刊時間的記載至今為止錯誤頗多，如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誤為1900年。按傳自身的說法，壬寅年應為1902年。
- 35)引自王擇華·王鶴《老成都系列·民國時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頁80-82。另據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一書介紹，「閱報社的建立成為一種風氣，大概是1904年以後的事。資料顯示，山東、河北、浙江、廣東、江蘇、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在這一年，都陸陸續續設置了閱報社。」，而「閱報社的大量出現是1905、1906年的事」(頁43、44)可見，傅氏辦的閱報所還是很早的。

- 36) 正如該報在〈本報告白〉中所說：「名報，其實是書，一回說點，可訂成單行本。」見《啟蒙通俗報》第3期。
《啟蒙通俗報》上連載的一些歷代白話史和蒙學教科書等，都可以待載完拆開再裝訂獨立成冊。
- 37) 這兩篇告示和傳單都載於《啟蒙通俗報》第12期。前一篇告示是上一期的續載，但由於未見11期，全文內容可參見1903年4月2-5日《大公報》。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一書有大部分徵引。據李孝悌稱岑制臺的這篇勸戒纏足的文字，是來自官方的最早的白話文告，流傳廣，且影響大，因而四川人停止纏足的人也比其他省多。詳見該書，頁31-33。
- 38) 同上注。〈本報告白〉中有一段寫到雜誌的銷售情況：「本報近來銷得甚寬，北京天津江蘇各省都來訂取，已消（銷）至千多了。本省各府廳州縣有愿代消（銷）本報的人，請來面議，格外讓價。」
- 39) 見《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1號。
- 40) 三愛（陳獨秀）〈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原載《安徽俗話報》第1期（光緒30年2月15日），引自《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頁23。
- 41) 見《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5期。
- 42) 傅崇渠在〈四川開官報說〉一文中，說：「我要為四川省賀喜了，賀的是制臺辦官報，喜的是制臺刻官書，開風氣。便寒士，不由你各屬不消（銷-筆者）官報，不通的人，他說是佔住幹，知理的人，他說是開導他。四川省已經如此，可喜可賀。做官的看官報，也知道交涉事情；做民的看官報，也知道中外大通；讀書人看官報，也知道學堂要興；手藝人看官報，也知道精上加精；買賣人看官報，也知道商務要緊；農夫看官報，也知道耕種改良；軍營看官報，也知道外國炮大；各人知道各人的，還不算通呢，要通同都曉得些，纔算得美。」載《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17期。
- 43) 引自《大公報》1904年4月14日。
- 44) 見《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15期。
- 45) 見《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5期。
- 46) 原載《大公報》1909年9月1日。同注2，頁72。
- 47) 孫文光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出版，1995年12月），頁827。詳見拙作〈《拳匪之原神出現》〉，《清末小說通訊》第54期（1999年7月），頁20-22。
- 48)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刊於1900年2月《清議報》第35期。
- 49) 〈勸人學西學要先實在學孔子〉載《啟蒙通俗書》第1年第1期；〈習西學要拏中學立根本說〉載該刊第2期；〈華人技藝不如西人論〉載該刊第1年第19期。
- 50)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晚清很流行的一種觀點，簡稱為「中體西用」，最早蓋出自張之洞的《勸學篇》（1898年）一書。
- 51) 小說《法郎剋令》，署「成都圖書局編輯」，載《啟蒙通俗報》第2年第4期「白話新書」欄。小說用白話的形式講述了法郎剋令即美國著名發明家、電學奠基人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的故事。
- 52) 《泰西說部的毒蛇案》即《毒蛇案》，柯南道爾（英）著、黃鼎、張在新合譯，1901年由啟明社以《泰西說部叢書之一》為名出版。《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4、第5期轉載，署「同安黃鼎、上海張在新譯、黃廣潤參校」，因停刊未載完。《泰西說部的寶石案子》即《寶石冠》，也為柯南道爾（英）著、黃鼎、張在新合譯，但《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12期，轉載時未署譯者名，未完。《拔斯夸姆命案》也為柯南道爾（英）的小說，載《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12-15期，未載完。參見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 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4月）。
- 53) 《活地獄》署「南亭亭長著」，1903年5月起在《繡像小說》雜誌上連載，估計《啟蒙通俗報》轉載於該雜誌。
- 54) 見《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1期。
- 55) 見《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3期。
- 56) 《讀書入門》全書標為73課，但實際上第15期連載中有兩課內容不同，但課名重複，即第67課、68課出現了兩次。如果按正常順序排列、總計應為75課。
- 57) 刊於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國際教養學部紀要》第5號（2012年1月）。

- 58)《類字集》一書署「日本堤秋水著、成都圖書局譯」,載第1年第17期至19期。《西哲名言》一書署「日本內田氏著、清國成都新樵譯」,始連載於第1年第17期,後第19期、第2年第1期、第2年第3期、第2年第4期,目錄上署「未完」,由於該刊不全,截止期不詳。《新譯學校衛生講話材料》,署「成都圖書局新譯」,連載於第2年第1期至第3期,《師範新講義》署「日本卒業生華陽王章祐演述」,連載於第2年第1期至第8、9期合刊號,後者名為《師範白話新講義》,為同一書。《心算一見曉》署「成都圖書局編印」,載於第2年第4期,未完。《中國輿地三字經》未署著譯者名,載於第2年第8、9合刊號。關於《西學訓蒙三字經》、《讀書入門》,詳見拙著〈從清末的蒙學教科書看近代國語教育草創期的特色 - 以《西學訓蒙三字經》、《讀書入門》為例〉。
- 59) 傅崇渠 1903 年春赴日本參觀在大阪舉行的第 5 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還在教育家伊澤脩二先生和木下廣次先生等陪同下參觀和考察了日本的學校、教育機構和設施,並購置了大量圖書、儀器和一部五色真筆版油印機。歸國後他撰寫了〈大阪觀會記〉(連載於《啟蒙通俗報》第1年第17期~第2年第3期)、〈調查日本學校記〉(載第2年第1期)等文章和〈附東遊寓渝題壁〉(載第1年第14期)、〈遊日本〉(載第1年第17期)等詩,其中由他帶回的一部分教科書由他譯成了中文在該雜誌上連載。
- 60) 刊於《啟蒙通俗報》第2年第4期。